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GLOBAL DIALOGUE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從政生涯

社會學志業

Chizuko Ueno, Vladimir Yadov

保加利亞的今與昔

Mariya Ivancheva, Martin Petrov, Georgi Medarov

馬來西亞社會科學

Shamsul A.B., Rahman Embong

- > 到貧民窟觀光
- > 孟加拉成衣工廠倒塌的背後
- > 你的論文被外包了
- > 突尼西亞社會學
- >影像社會學
- >給ISA會員的折扣書籍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第3卷/第4期/2013/8





> 主編的話

新社會學

體憤怒目前在全世界仍然繼續創造著歷史,並且把這個火炬從 Gezi Park 和 Taksim Square 傳到巴西和埃及,並且不斷創新。Tahrir Square 的群眾雖然難以預測結果,但是他們堅定拒絕被政治收編。這些文化上相似,但是政治上卻獨立的運動席捲全球,為社會運動理論帶來挑戰,也催生著新的社會學的誕生。

新社會學必須處理政治與經濟的複雜牽扯議題。這期全球對話討論了資本主義的第三波市場化:新自由主義化。Mallika Shakya 分析了孟加拉成衣工業悲劇的全球結構性原因;Bianca Freire-Medeiro 描述巴西貧民窟的新興觀光產業;Jeff Sallaz 則解釋出版工業外包,並把我們的論文賣回給圖書館,藉此賺取鉅額利潤。此外,關於個人的生命史,Rahman Embong 則告訴我們社會學在馬來西亞已經被邊緣化,因為大學需要會賺錢、在政治上不找麻煩的科系。

我們要到哪裡找這個新的社會學呢?我們至今已經介紹了許多東歐後共產的社會學面貌,包括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東德。這期有3位保加利亞的社會學家挑戰辯論裡的概念。Martin Petrov 描述了 Sofia 街道上的故事如何和共產主義交織而成。Georgi Medarov 回顧了前共產主義的複雜政治圖像,以及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Mariya Ivancheva 則批判反省了委內瑞拉社會主義與東歐社會主義之間的差異。這些文章都企圖藉由過去替未來找尋出路。

新的社會學需要新的方法才能夠解答複雜的歷史與社會謎題。我想,Jordanna Matlon 訪談 University of Evry 的 Joyce Sebag 和 Jean-Pierre Durand 是個再好不過的開端了。藉著這個影像社會學得專題,我也在此跟各位邀稿(高解析度照片和 300 字以內的描述),全球對話的影像社會學專欄誠摯歡迎來稿!

全球對話以 15 種語言刊出,請至 <u>ISA website</u>。 投稿請寄給 <u>burawoy@berkelev.edu</u>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巴西兩屆總統 (1995-2003), ISA 會長(1982-86), 社會學家, 正在談論身兼社會學家和總統的利與弊。



Chizuko Ueno,著名的日本公共知識分子, 社運者,社會學家,正回顧成為女性主義 社會學家的經驗。



Vladimir Yadov,蘇維埃時期的社會學先驅,於 Putin 時代致力保護社會學自主性。前 ISA 副會長。他受到許多學生愛戴。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王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Hamidreza Rafatnejad, Tara Asgari Laleh, Najmeh Taher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Yutaka Maeda, Shuhei Naka.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Natalia Jońca.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Monica Alexandru, Telegdy Balasz, Marian Mihai Bogdan,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Alexandra Duţu, Cătălina Gulie,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Lucian Rotariu, Cosima Rughiniş, Alina Stan, Mar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s.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Eleonora Burtse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Julia Martinavichene, Ekaterina Moskale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烏克蘭: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y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v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y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新社會學	2
社會學家作為總統 訪談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巴西	
社會學作為志業:成為日本的女性主義者 by Chizuko Ueno,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	7
社會學作為志業:社會學家的天命	
by Vladimir Yadov, 俄羅斯	ğ
> 貧窮	
貧民窟觀光	
by Bianca Freire-Medeiros, 巴西	11
孟加拉成衣工廠倒塌的背後	
by Mallika Shakya, 印度	14
你的論文被外包了	
by Jeffrey J. Sallaz, 美國	17
給ISA會員的折扣書籍	
by Sujata Patel, 印度	20
. Pré-las-é-liqué	
>保加利亞	
兩種社會主義 by Mariya Ivancheva, 匈牙利	22
Sofia街道上的故事	22
by Martin Petrov, 保加利亞	24
後共產保加利亞的大屠殺辯論	
by Georgi Meda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亞	26
7 7 7 1002 100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社會科學	
by Shamsul A.B., 馬來西亞	28
訪談Dato Rahman Embong, 馬來西亞	30
> 社會學 Live	
突尼西亞社會學	
by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亞	34
影像社會學	
訪談Joyce Sebag and Jean-Pierre Durand, 法國	36



> 社會學家

總統

訪談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巴西兩屆總統 (1995-2003),ISA 會長 (1982-86),社會學家這篇訪談是 Cardoso(以下簡稱卡)於 2004年,也是他卸任總統後的一年,於美國社會學年會發表的閉幕演講。

布:Cardoso總統,社會學如何影響了你的總統生涯?特別一提的是,你還是一位大國的總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統。

卡: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或是學術生涯也一樣,我想那就是我信仰著某個理念。若你沒有理念,沒有立場,而又想做些什麼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須有個信仰。我知道這種說法和一般的政治人定義是背道而馳的。當然我想我和你一樣,讀過韋伯。而韋伯區分出心智倫理與責任倫理。但是他從未把兩著獨立開來為政治行動賦予意義。相反地,他同時考慮這兩者。韋伯本身就是個德國民族主義者,他有他自己的堅持與價值。

若你有理念,而且也有能力適時適當地表達出來的話,那麼,你可以成為政治領袖。沒有這項能力是不可能涉入政治的。你可能被選上,但是缺乏理念的政治人物很難成為政治領袖。以我為例,我這個世代最可以召喚我們熱情的,並不是追求經濟發展,而是民主。民主是我的理念。

當時當我直接射入政治時,那還是個威權的年

代。人民的自由被剝奪了。你會看到人民被驅逐,被送入監牢,甚至被刑求。改變這一切遂成為了我們這個世代的主要訴求。這就是我們對民主的渴望,對民主的理念。

布:民主是一個模糊且被濫用的字眼,你所謂 的民主為何?

卡:民主當然有很多種形式,但這都是同一價值的不同表現與不同組成。當今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是政黨與選舉而已。我必須說,在某個意義上,我從不屬於特定的政黨,從不是一個黨派分子。我不喜歡做一個黨派分子。當我在地一次競選參議員時,我對著我政黨的人說,我討厭政治好戰份子。

我也不認為政治和政黨是相等的。當今世上最 重要的就是擁有廣泛接觸社會的能力,並且可 以清楚的跟各種不同的人們闡釋自己的政治理 念。

所以成為一位成功的政治人,必須有能力去召



唤、溝通、以及觸動人民的情緒。某個程度上 你必須像是個演員。往好的方面來說,成為演 員並非是你真的在演一齣戲。這不是我所謂演 員的意思。我是說你必須有能力去感受情緒, 去傳達情緒。我可以投身政治或許就是因為我 喜歡人民吧。作為總統,我試著去和百姓感同 身受。總統向來是和民眾有很大距離的。可是 總統身邊也有侍者啊,也總是有民眾關心著總 統啊,甚至在游泳的時候都有很多人想接近你。 而且我們有司機,有保鑣,這些圍繞在我們身 邊的人都是普統百姓。所以我試著去和這些人 聊天,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可以和我閒話家常的, 不用老是把我當總統看啊。而且我也試著去傾 聽他們的感受。所以身為演員並不是說去當一 個表演者,而是去藉由傳達情緒影響公共事物, 展現你對理念與核心價值的真誠信仰。這也是 身為一個人的意義所在。

布:社會學有幫助你成為一位真誠的人嗎?

卡:社會學幫助很大!在巴西和我競爭的人一 我的對手一總是說「瞧!這個人從來沒有窮過, 法文比葡萄牙文說得還溜呢。」他們喜歡說這 類的話來貶低我,但可惜他們沒抓到重點。我 在國外當教授的經驗教導了我一件事:我說話 必須了當直接,不能像知識分子。

我記得當我被軍政府驅逐出境時,我開始在智利教書。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很像,但終究不同。巴西人可以瞭解西班牙文,但是講西班牙語的人卻不行瞭解葡萄牙文。智利那裡抗議我每說的任何一個葡萄牙字,所以我必須簡潔。

還有身為社會學家,很重要的是一而我們也這

麼被訓練一和人們互動。當反對者說「這個人不懂貧窮家庭」時,我總是一笑置之,因為我社會學的第一個研究就是和黑人住在一起,研究種族關係的。所以我拜訪了許多的南巴西貧民窟。我後來研究工人,然後是企業家。我的社會學生涯就是從研究弱勢族群開始的,怎麼會不懂貧窮是什麼呢?

我也修過很多人類學的課。事實上我們當時是一起學這三門科目的: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而且你知道人類學家看很細節的事物一我太太就是人類學家。所以他們喜歡和人們說話,作筆記,對小改變很有感受。對政治人物來說,這種瞭解他人與溝通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這讓你可以影響他人,也可以成為一位演員。如同我之前強調的,用簡單直接的方式去表達你真實的情感。

布:社會學也可以是拐杖?

卡:是的。的確,我記得我第一次競選時我其實很害羞。但是競選就是要接觸群眾。他們會拉著你不放。我記得第一天競選活動結束後我累癱了,熱情簡直被耗盡了。競選其實是一場內搏戰,人對人的內搏戰。這不是演講,而必須真實碰觸人民。你必須越靠近越好。這是需要訓練的。所以一開始對我來說並不輕鬆。

但是,講話也很重要沒錯。對學術人來說,對 群眾演說並非易事。你必須簡單且肯定。不要 想說講很偉大的演講,因為人民不喜歡。這對 教授來說很不容易啊。我記得在一開始我努力 試著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給不同的演講,因為一 天下來其實有8到10個場次,每場都講一樣的 東西讓我覺得很丟臉。所以我要針對不同群眾給不同的演講,這可讓我忙翻了。

因為沒有人真正瞭解你想說的,所以你必須一再重複同樣的事情。你必須簡化且不斷重複。在那樣的場合,要當一個社會學家或者是政治人物,是很不容易的。不過一旦到了電視上,我們就很有利了。我第一次競選 São Paulo 的參議員時,那時還是軍政府統治,我參加電視辯論,對手是執政者。我在辯論中相當冷靜,因為我當老師很久了,這對我來說輕而易舉。

當我回家後我的朋友卻很失望。他們說,你看起來沒有熱情,沒有情緒。可是對觀眾來說,影響卻是正面的,因為電視需要的是對話,比起公開演講需要更深入的對話,所以我佔了優勢。這個優勢是從我當社會學家和老師中得來的。對我們來說上電視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表現得像一位好老師,清楚傳達理念,對我們來說相對容易。

布:你怎麼處理政黨議題?

卡:像我說的,在巴西,重要的是領導者可以 把願景呈現給全國人民,而不是對政黨負責。 領袖必須說服多數的人相信你,甚至有時要繞 過政黨。

政黨很多時候更有可能是保守而非進步的。政 黨並沒有準備好去創新,所以你必須繞過這個 結構。同時你也必須去瞭解到沒有政黨結構, 你也很難成功。所以你不行和政黨對抗。如果 你直接和政治系統起衝突,那麼就會變成有可 能成為獨裁者或是被彈劾。

你可以操縱群眾並且動員他們對抗國會。利用電視也不難。但是這條路是獨裁者的方式。我們必須用民主的方式,並且不讓人民對抗國會,因為國會有可能是改革的阻礙。所以你要準備好和國會一直協商,這裡社會學的訓練就派上很大的用場了,因為你有能力瞭解什麼是真正的核心利益所在,這不只是針對政黨,還包括了其他群體、組織以及個人。另外,把公眾利益放在心裡是很重要的。

布:你也面臨過全國危機,那你對於當時的危機回應方式怎麼解釋?

卡:你要總是保持冷靜,特別在危機時刻。例如,面臨全球金融危機時,你的政府和你自己有可能都會被淹沒。此時,有分析的能力去看到更大的圖像可以幫助你保持冷靜。你必須在不同的層次行動,有時親近人民,有時保持距離,所以不會讓整艘船搖晃,反而可以提供航海地圖,並且掌舵,帶領大家航行。

在這些時刻中,總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去保衛國家長遠的利益,不讓國家瓦解。國家崩解需要很長的時間重建,也要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這就是為什麼當風向對時,要會乘風破浪,抓住機會往前進。這會讓你變得更強壯,在壞的時機可以保住整個體系不會瓦解。

在什麼程度上這和社會學訓練有關?我會說很大的程度有關。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和能力。 不過,基本上我認為社會學的訓練給了我們更 寬廣的視野,給我們更好的能力去參與這個不 同群體互動的遊戲之中,也讓我們知道沒有單 一的方式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布:最後談談你對於政治的社會學看法?

卡:政治,由其是民主政治,需要永恆不斷地 溝通。回到盧梭的普遍意志,我會說普遍意志 每天都不一樣。所以政治人物必須容許這個變 化,讓更多的人可以進來討論政治。人民不再 滿足投票而已。正當性不只來自於投票。現在 需要的是對於核心理念的不斷確定。

我好幾次獲得了數百萬得票,且兩次的總統得 票率都過半,但這些都不夠,你還是必須每天 建立正當性。這幾乎就像是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若有人說他可以從此永久獲得人民的信賴的 話,肯定是騙人的。你必須不斷更新人民對自 己的信任程度,不斷地重複自己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最後的建議是:搞政治很難!別輕言進入!■

> 社會學志業

成為女性主義者

by Chizuko Ueno, University of Tokyo, 日本



Chizuko Ueno.

Chizuko Ueno 是日本有名的社會學家,女 性主義者,公共知識分子。她帶領日本的女 性研究蓬勃發展,並且是許多書的作者,包 括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Modern Family (1994, English translation 2004), Nationalism and Gender (1989, English translation 2009), The Erotic Apparatus (1989),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2002), A Thought for Survival (2009), Misogyny in Japan (2010), Sociology of Care (2011)。她也是女性主義 運動者,是社運組織的領袖:Women's Action Network (http://wan.or.jp/)。可以 看她地演講:「日本女性主義者40年的經驗」 (http://worldwide-wan.blogspot.jp/) • 其中她描述了在成功與失敗中的平衡點。

會學家是我自我認同的方便標籤。以社會學之名,我可以思考任何我日常生活的題材作為研究課題,從看漫畫到和在巴士上與人攀談,都是範圍之內。作為社會學家,我有很深的懷疑主義,對社會尤其如此懷疑主義,或是懷疑主義的性格讓我喜歡社會學。我可以確定的是,社會學可以讓我看到什麼很愚蠢,什麼很奇怪。這種能力說我在性別研究中如魚得水,因為被性別化的愛諾我在性別研究中如魚得水,因為被性別化的愛諾我在性別研究中如魚得水,因為被性別化的還說,一个天的謬論學可以讓我年輕時有句話這麼說:「今天的謬論會成為明天的常識!」許多方面看來這句話說得還針對,至少在性別領域可是千真萬確。

大概 40 年前,當我還是大學生時,那時是 1970 年代,學術界還是男人的天下。男人和女 人一起會出現在學生運動中,可是對女性來說 那經驗卻是很糟糕失望的。學生運動完全是男 人的遊戲,女性沒玩的份。男子氣概在我看來 既充滿性別偏見又保守反動。

在學生運動結束之後,我到研究所唸社會學。可是,這只是一個休息站,並沒有任何的學術期望。在那裡我接觸到了女性研究,剛剛從美國引介而來。那是一個大開眼界的經驗,我透過自修學到了非常非常多。我甚至質問我自己我是誰,而「作為女人」是最核心的問題。我很幸運我有歷經過那樣的思考。

我被認為是日本女性研究的先驅,因為還真的是前無古人。我們這一個世代的女性研究都是自學而來的。我們組成讀書會,相互學習,出版雜誌,然後推廣。我作為社會學者,其實對於既有的社會學感到很無聊,所以我開始投入性別研究,因為我可以很專心致力於此,而且不會受到情緒的打擾。

女性研究在日本是誕生於學院之外的。一開始我們並不期待可以得到教師職位、研究資金、發表期刊等,所以我們一切從零開始。女性研究那時不被看成是嚴謹的學科。但是短短 10 年內,在 80 年代,許多學術期刊開始引用我們的文章。所以,20 年後,也就是 90 年代,我在University of Tokyo 有了一個性別研究的教職。那可是日本最負盛名的學校。在我課堂上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研究題目,像是女性漫畫、同志、單親媽媽的論述結構,以及自慰的歷史等。這些主題之中,他們可以自由撰寫學士、碩士、或博士論文。不過我也必須說這不保證日後一定可以找得到教職。

社會學幫助我發展出了女性研究的領域。從Gayatri Spivak 的後殖民寫作中,她說「用敵人的武器去作戰」。我寫的書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1990) 中指出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中,有些東西錯了。我其中一位讀者說:「讀了之後,我開始瞭解我太太的抱怨了。」是的,他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傾聽老婆的聲音。但是為了幫助他們瞭解各自的問題,我們除了使用霸權語言之外別無他法。這和後殖民情境類似,學者用英文在學術界中生存,全球化也代表著英語化。所以,我開始使用兩種語言,同時用英

文和日文。這像是男性和女性的語言一樣,也像是學術與常民的語言,更像是官話與方言的對比。社會學就是在兩者之間徘徊,Karl Manheim 所謂的邊緣人理論,不無道理。

女性的研究在功能上和女性主義的行動是相等的。在女性研究制度化之後,許多問題都得以展開,例如:我們都對研究結果負責嗎?女性研究有改變了男性中心主義嗎?或是女性研究調整了自己以利於制度化?這些問題和女性從軍的問題很像,像是女性改變的軍隊,或是女性從軍後被軍隊同化了?誰先,誰後呢?可惜的是,歷史告訴我們,後者先,是制度吸收了異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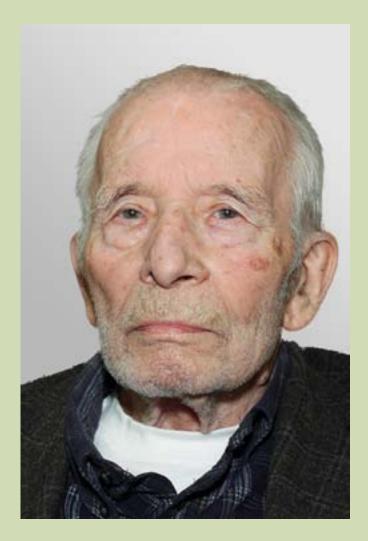
我們然仍跟許多基本的科學原則奮戰中,像 是客觀性、中立性、可檢證性、可否證性等。 我們若沒有了價值判斷,是要如何才能找到好 的研究題材?沒有價值,我們怎麼判斷是非? 沒有希望,我們要怎麼撐過研究的煎熬以及很 少的回報?

現在我已是退休教授了。我不得不說,我實在很高興我是一位社會學家。社會學已經是我 生命的一部分。■

>社會學志業

社會學家的天命

by Vladimir Yadov, Institute of Soci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前ISA副會長(1990-1994)



Vladimir Yadov.

Tladimir Yadov 是蘇聯的社會學先驅。 蘇聯把社會學看成是布爾喬亞的學 科。在 Leningrad University 任教時 的 Yadov 成立了社會學研究室,出版了 Man and His Work 以及許多方法論的書。他也 致力於社會心理學理論,社會行為的自律等 領域,也被選為實驗社會心理學歐洲學會的 會長。在後蘇維埃時代,他成為了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社會學主任,發展 多元典範的社會學。多年下來儼然是國際上 蘇聯社會學的代言人,在 1990 和 1994 年是 ISA 的副會長。他同時也是蘇聯自由派社會 學家,和新保守主義對學派對抗。他也很受 到學生的歡迎,桃李滿天下。

成為社會學家的經過要回朔到 1960年代,而現在是個好的時 機作個總回顧,看看我這場社會 學的旅程走得如何。我其實很幸運成為 一位社會學家。以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政府把社會學視為是布爾喬亞的學科。 可是,在斯大林政權之後,整個學術的 氣氛就比較自由一些。我的同事和我一 起著手在 Leningrad 大學設立社會學研究室。同時,Study of New Forms of Labor and Leisure 也在蘇聯 Academy of Sciences下的哲學院成立。這就像是一波社會學運動。不過,這些先行者的教育背景不一樣,而且多數是自修而來,自己找英文書來讀。

和波蘭的社會學家溝通之後,因為波蘭的社會學有更好的基礎,即使在鐵幕之下也是如此,於是蘇聯和波蘭與東歐的學者開啟了許多合作研究計畫。我很幸運地和 Jan Szczepa ski 有著密切的聯絡,而 Zygmunt Bauman 教我理論,以及 Stefan Nowak 花了很多時間跟我解釋田野方法。我現在是 University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人文與社會學院的院長,繼續和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社會系有密切合作。Krzysztof Kosela 從 Stefan Nowak 那邊得到了真傳。我想這個傳統會一代接著一代,傳遞下去。

在1958年蘇維埃政權核准設立了蘇維埃社會學會,但是還是在意識型態的控制之下。其內部的章程說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而且政府規定會員在國際場合要宣揚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不過年輕的社會學者在國際的場合和許多其他的國家學者建立了有好的關係。

社會學在俄羅斯現在是個普及的大學 學科。可是很不幸的,社會學家好像並 沒有專業的認同。社會學的社群被分為許多小團體。其中一個是後蘇維埃的文化創傷。如同 Piotr Sztompka 所說的,這是蘇維埃社會的分化結果。 Viktor Vakhshtayn 的文章有這個現象最好的解釋。1

社會的疾病一腐敗、族群衝突等等一 是這個時代的主要研究課題。可是在方 法論的層次上,即使是學術的計畫中, 俄羅斯社會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理解程度 仍然低於蘇維埃時代。其中一個原因就 是沒有優秀的學生願意擔任學術教學的 低薪工作。所以,從公共的角度來看, 社會學專業已經和民調劃上等號,許多 人認為社會學家和記者一樣,特別還是 記者之中有些人還會為了某些特定目的 去操弄資料結果。

在任何的環境裡面,社會學家的公民責任並不亞與其專業知識與經驗的要求。當我和學生溝通時,我總是抱著樂觀的態度。雖然很少人選擇這像專業作為職業,但是我還是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新的一代將會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把社會學發揚光大!

1. V. Vakhshtayn,「令人失望的後蘇維埃社會學」(Global Dialogue 2.3); Zh. Toschenko and N. Romanovsky,「俄羅斯社會學的真實面貌」(Global Dialogue 2.5); V. Vakhshtayn, "We have it all. But do we have anything?" (Global Express 8.20.2012)。

>質民窟觀光 下存!

by Bianca Freire-Medeiros,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in Rio de Janeiro, 巴西



藝術家 J. Koolhaas 和 D. Urhahn 眼中的 Santa Marta。這個貧民窟的重新設計由居民合力完成,代表了美學介入引導了觀光客的目光。 Bianca Freire-Medeiros 攝影。 Rio de Janeiro、 Cape Town、Soweto、Mumbai、 Manila、Jakarta、Cairo、 Nairobi 等地,從 1990 年 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 全化和媒體文化,這些全 球南方的大城都可見這些 觀光商品,並且被推銷者 和消費者大力支持著。

Rio de Janeiro 有 20% 的人口是貧民,換算成 數量是一百三十萬人,散 住在上千個貧窮社區中, 不盡相同。在國際上,巴 西的形象除了嘉年華、足 球、辣妹之外,貧民窟正 是特色之一。在巴西國



在 Santa Marta 可見外國觀光客正在看 King of Pop。此圖由著名巴西藝術家 Romero Britto 所繪。Bianca Freire-Medeiros 攝影。

内,大量的文獻指出貧民 窟已經是論述和現實的共 同指涉了:不平等、暴力、 公民權等,都和貧民窟有 關。這個過程中浮現了一 個概念:「貧民窟觀光」。 這個概念作為了國際商品 和交易的符號,已經被用 在各種商品的廣告中了, 從 Citroën 和 Nissan 的 車 子、Ikea的家俱等等都 是,其他包括餐廳、書 店、俱樂部也是。作為觀 光景點,這是全球化論述 和實踐的其中一環,將貧 窮重新指涉為消費的商 品。另一方面,這也是實 境觀光的其中一項。觀光 客在專業人員的引導、保 護下,其實很安全,然後 又可以看到和世界迥然不 同的景象。

在巴西,政府一開始 是忽視這個現象的,並且 總是大力抨擊之。巴西的 精英則是認為貧民窟觀光 有損國家的形象,並且把 窮人當作動物園裡面的動 物一樣展示,是很卑鄙的 行為。現在,人們則要重 新設計這個貧民窟觀光事 業,藉著世界盃足球賽 (2014) 和奧林匹克運動會 (2016) 的舉辦要推銷這個 城市。有兩個事件是歷史 上促成此發展很重要的轉 折,幫助我們理解這整個 軌跡如何形成與鞏固。

> 1996年1月

Michael Jackson 到 巴 西 發表了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的音樂錄影帶,由 Spike Lee 執導。在 Rio de Janeiro 的 Santa Marta 貧民窟位於南區的富裕地帶,主要就是要呈現政府如何默視這個貧窮社區的蔓延與惡化。

雖然 Santa Marta 貧民 窟的人很歡迎這個點子, 政府卻很火大。Rio de Janeiro 的州長 Marcello Alencar要 Michael Jackson 證明他出自善意,並且要 拿出錢來幫助該社區。前 足球明星同時也是後來體 育部長的 Pelé 則認為這 可以幫助巴西爭取到舉辦 2004年 Olympic 的機會。

而政治溫度上升到最高點時是因為有消息指出租借場地和僱用居民的費用已經由 Spike Lee 和Marcinho VP (Santa Marta最大的毒梟) 橋好了。結果政府命令停止拍攝影片,認為已經損害到巴西,認為已經損害到巴西西人,香蕉共和國」,更加激怒了巴西政府。

> 2010年8月

Santa Marta 貧民窟歡迎當時的總統 Lula。Rio de Janeiro州長 Sérgio Cabral和 Rio de Janeiro市長 Eduardo Paes揭幕 Rio Top Tour的觀光計畫。這個計畫有來自於巴西觀光部的大力支持,還有 Pacifying Police Units (UPP)的背書。1

總統 Lula 認為 Rio Top Tour 觀光計畫是相當具有 潛力,並可以藉由納入居 民來補償他們。此外,政 府也支持這個旅遊計畫。 諷刺的是,過去拒絕 Michael Jackson 的城市現在 豎立了這位流行教主的青 銅像,並且成為了 Santa Marta 貧民窟的大熱門景 點。

> 2013年5月

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在 不 只 包 括 Santa Marta 和 許多其他貧民窟的地方, 市場認證正在進行中。這 是國家支持的政策,而且 廣受社會各界好評,特別 是由貧民窟自己發起的。 從 Foucault 的角度來看, 治理型態不僅僅從外部而來,還從內部那些貧民窟 觀光企業家的自由主自主 而來。

用Boltanski的話來說, 貧民窟作為觀光景點的價 值現在已經由這個觀光 事業的效率所決定了,也 被貧民窟的居民影響,更 會被其是否有能力展現所 謂的貧民窟而貌而影響。 這些包括了貧窮、混亂、 暴力、歡樂等等。照此邏 輯,觀光客也會從這個市 場邏輯來評價這個景點。 觀光客因此是消費者,透 過他們購買門票、紀念 品、食物飲料等等,將為 這個貧民窟帶來經濟效益 和社會發展。

很重要的是,我們並沒有看到國家的退位。貧民窟的觀光需要政府的同意,但是內部的的實際情況是被法律或非法的權力所結構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管制國家領土的一連串策略,並且深深地被市場所決定。■

註 1:2013 年 4 月, 有 32 個 位 於 Rio de Janeiro 的 favela 被重新美化,用的是一 樣的策略: 在 BOPE (Special Force Unit)之前政府就先介 入,讓罪犯先行離去,好避免 警察和罪犯之間的衝突。

> 孟加拉 成本工廠倒塌 事件的背後

by Mallika Shakya, South Asian University, Delhi, 印度



Savar 事件中的兩位罹難者身影。Taslima Akhter 攝影。

2013年4月在孟加拉h的Sayar之工廠倒塌事件中,共有1100名成衣工人喪生。儘管引起了大眾的憤怒,可是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至今還是沒有受到重視。

>「東方主義」的報

導

「這是孟加拉的另一場悲 劇 New York Times 如 此報導。 這個描述也被 BBC . Globe and Mail . Reuters 等採納。這些西 方媒體都不願意把這個事 件看成第三世界因為貪婪 資本家,腐敗政客,無能 政府共生下所造成的悲 劇。事實上那些窮人別無 選擇,為了餬口只好把自 己暴露在高危險的工作環 境之中。東方主義的觀點 也是理性主義的觀點,因 為這種看法讓那些布爾喬 亞的販售商認為解決方式 只有靠工廠本身以及消費 者的行動。

媒體一開始把矛頭指向工廠的主人 Sohel Rana,因為他說工廠很安

勞工組織一直是這 次災難的核心。許多在 Rana Plaza 死亡的工人是 由於他們被迫要繼續在 牆壁破裂的狀況下繼續 上工。他們沒有工會。 在這個工業民主的國家裡 面發生這種事情,和那些 在地與國際的資本家,以 及政府脫離不了關係。國 際的資本讓工人變得更不 可見,被隱藏在世界銀行 經濟或貿易指標的後面, 而且這些行動者一再強調 由資方和政府所主導的經 濟產業中, 生產力和工人 安全更能大大提昇。在這 個霸權底下,工會無法成 立。不論在孟加拉或是其 他亞洲各國的成衣產業 中,皆是如此。這種把勞 動過程去政治化的想法就 是把工業視為只是供給與 需求的市場法則,完全忽 視任何複雜的政治經濟因 素。

> 多重纖維協定

(MFA)



在多重纖維協定之後的成衣 貿易變得相當競爭,而且整 個產業更加危險。 把市場看作是成衣工, 業全球化的唯一驅動力。 這個看法大有問題。 達個看法大有問題。 達個看法大有問題。 達種勞力密集的產業的 帶來了銷售店家的增多, 帶來了銷售店家的增多, 世界美國毛衣生變 是東歐的世紀中期之後變 之。 是中期之後變 之。 是可亞洲。 是可亞,

多重纖維協定(The 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制定於1974年,內容規定得鉅細靡遺,主得鉅無之得鉅無之後有可以進四,數國家不可以進四,與國家不可以進四,與國家不可以有生,與國的成之後有一個人。 在美國的利益主導下,被賦予少量的額度,像是孟加拉等其他國家就擁有高額 度。所以這不難想像為什麼 1970 年之前沒有什麼 成衣業的孟加拉會在短短 幾十年間就有 3.5 百萬的 成衣工人。

MFA 當時只被視為是 暫時的,不過後來協定 延長了四次。在1977、 1981、1986、1994 分別延 長了,並且更加深化其影 響力。可是,當世界貿易 組織 WTO 在 1995 年成立 之後, MFA 被視為要在 2004年12月後永久失效。 失效當然是轉變了全球的 成衣產業結構。尼泊爾和 印尼等國認為成衣工業從 此會垮,中國和孟加拉則 成為新的贏家。這助長了 新字由主義全球化,壓低 工資,工作條件惡劣,一 切都為了競爭市場被合理 化為必要之惡。

MFA 的短視和新字由 主義的邏輯解釋了為什麼 在孟加拉的成衣工廠都

如此破爛。發給建廠執照 給 Rana Complex 的 市 長 之所這麼作,是因為主管 機關非給執照的速度追不 上成衣工廠的設立速度。 所以,若只是追究工廠主 人和幾個商家的責任,就 像是處罰種族主義者卻不 責備種族隔離制度一樣, 沒什麼道理。這場災難造 成的社會抗爭和怒,已經 在侵蝕整個國家的穩定基 礎。這也是全球貿易失 敗的象徵,也看到了企業 像是 Rana Complex 和 Joe Fresh 的無動於衷。■

>你的論文被外包了

by Jeffrey J. Sall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美國



菲律賓論文外包的工作場景。

算 許多其他的科學 家一樣,我長期 以來就很好奇我 的論文發表在期刊後到底 命運為何。若出版了,那 有可能就是被總編送到了

其他編輯手上,可能就在 隔壁而已。數十年來,出 版媒介的物理限制,亦即 論文紙張有質量,讓論文 不能大量且迅速地傳播的 很遠的地方,於是就讓出 版的過程有地理上的集中 化傾向。期刊雜誌的辦公 室、編輯人員、印刷廠等 等都在同一個地方,同一 個城市,甚至在同一棟辦 公大樓裡面。他們之間透 過各種組織或是人際網絡 串連起來。

但是這個傳統的模式 漸漸沒落了。我過去幾年 致力於研究「知識外包」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KPO) 的現象在 東南亞如何產生。明子 東南亞如何產生。研究出了 包括在全球北方僱用很做 等,長時間工作。 對 等,長時間工作。 對 等, 對 國外南方的企業連起來。

> 出版的巨獸

若 KPO 的廠商是知識生產鍊的富士康,那麼誰是蘋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瞭解科學出版的結構轉型過程。今天都們看到的不是在各個學出版社所連結對的出版社所連結起的網絡,而是近期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總編所說的出版巨獸。

最惡名昭彰的例子是Elsevier B.V.。這是一家在 Amsterdam 的出版社,是 Reed-Elsevier 集團 的子公司。這個集團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榜上有名。證券交易所上榜上有名。根據經濟學人雜誌有名。根據經濟學人雜誌有名。與 2000 份學術期刊,佔據了 25% 的學術與科學發表量。2012 年其邊際獲利是 40%。

最近許多科學家抗議 抵制這家出版商的期刊, 理由是他們對個人與機 構收取了過高的期刊使用 費。可是 Elsevier 的經營 模式早就被廣泛模仿採 用,滲透到了整個學術之 市聲產過程之中了。

> 供給鍊的組織

人要不斷地產出,直到被 取代為止。

為了解釋這個 KPO 生產過程的複雜性,我可以說,你的下一篇論文一定是被外包製作的,被送到一個有 40 到 50 條生產線的地方,當然在全球南方,然後那些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是 0.5 美元。

例如,從我的田野經 驗中,整個論文加工的過 程如下:作者的論文接受 刊登之後,出版社開始把 整批的論文送到菲律賓, 透過 FTP 的方式,然後 一些前置編輯就開始處理 邊界、排版等手續,插入 XML 標籤。接下來還會 被送到印度,印度那邊有 很多大學生接受了短期編 輯課程的訓練,好可以趕 快上手去檢查文法、文句 的錯誤。最後整個論文又 被送回菲律賓,把論文製 作為可以出版的 PDF 格 式。

>學術富士康化 1

我們社會科學家怎麼去回

應這個論文外包的問題、 實踐社會正義呢?這可不 是個簡單的問題。若我們 抵制某些期刊,那麼只是 助長了保護主義和排外主 義。這些工作可以由可以 由美國人或加拿大人作, 那又為什麼應該把他們排 后呢?

 繼續為這個不正義的體制 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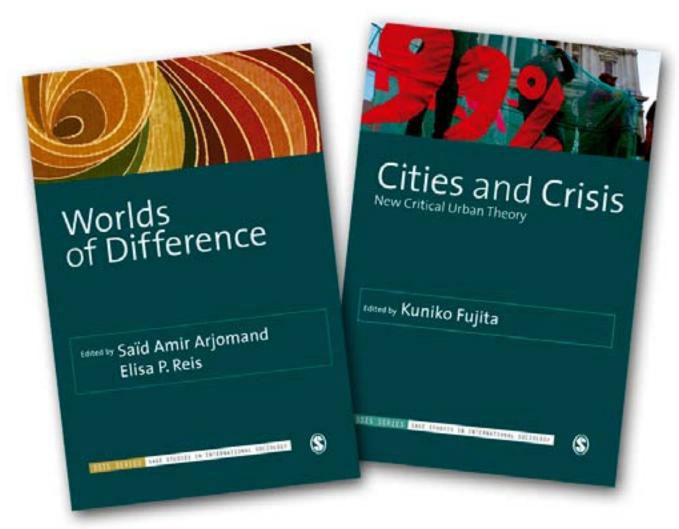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要 求透明化。我們可以要求 我們的論文更加公開透 明。出版商向來很努力地 把整個供給鍊的過程遮蔽 起來,像是不準編輯跟作 者诱漏其國籍等身份。但 是這卻違反許多製造業和 服務業的標準流程。美國 的汽車廠商會報告有多少 零件是在美國生產的。蘋 果也標示「美國設計、中 國製造」。所以,出版商 更不能有特權去制定自己 的遊戲規則。若是他們同 時壓低成本又提高售價, 那我們學者,同時作為生 產者與消費者,就更有理 由去要求知道那些將我 們論文加工出版的工人是 誰,其工作環境為何。■

註1:富士康是一間台灣的公司,是 Apple 的合約廠商。在 2010年位於中國的工廠爆發勞工跳樓事件。

>優惠價格 問書籍

for ISA Members

by Sujata Patel,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編輯



SSIS 系列的頭兩本書,在印度可以優惠的價格購得。

I SA 的會員應該會很高興聽到這則消息:今天起,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SIS) 的出版書籍將一律 9.99 英磅,這幾乎是原本價格的

10 分之 1。而且還包括郵資。我們公佈這個好消息的同時,也要告訴各會兩本新書的出版:Worlds of Difference,由Said Arjomand 和 Elisa Reis 編 輯;Cities and Crisis, New Critical Urban Theory由 Kuniko Fujita 編輯。在印度的 ISA 將可以以 Rs 750 的價格購買。(出版日:2013 年 8 月)。詳情請見 http://www.isa-sociology.org/publ/isa_handbooks.htm.

另外我們也展開了另一個新計畫: Key Texts of World Sociology。這是為了 推動在大西洋地區之外的社會學文本。 這些文章書籍將會把世界上具有影響力 的書籍都會聚一堂。目前我們主要收集 來自下列地區:(1) 東亞(中國、日本、 韓國、台灣);(2) 拉丁美洲;(3) 中、 東歐(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波蘭、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4) 非洲;(5) 阿拉伯地區。

SSIS 是 ISA 最具歷史傳統的出版項目之一。其原本叫做 Transactions of the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從 1949 年第一次世界大會開始出版。後來在 1974年改稱做 SSIS。從那時起 SSIS 就開始出版世界大會的論文集、各個研究委員會或是國家學會的會議論文等等。也包括了各種形式,像是著作、編輯、主題論文、手冊、參考書籍等。這些總共超論了 60 本書,可謂貢獻良多,並且對各個領域之中各種辯論和討論的介紹有著很重要的角色。

儘管有其重要性, SSIS 系列書籍的 銷售始終不高。或許因為售價高昂 (80 到 90 英磅),即使在全球北方其主要銷售也是在圖書館。全球南方甚至連圖書 館都沒有採購。過去 3 年來,由於出版 委員會和會長與副會長的支持,我已經協調 Sage 出版社(倫敦)可以再印度以很的低廉的價格販售(大約10英鎊)。可惜的是,我們還沒有辦法解決一個棘手的問題:國際(全球北方出版的書)和在地(全球南方出版的書)的分野。在印度出版的書籍和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地的書籍是就是專針對地方市場去銷售,全球北方的則相反。所以國際的出版商(像是 Sage、Oxford、Routledge)在低地開發的國家中有貿易協定,讓這個分野更加穩固。

然而,這個問題可以有處理方式。 我們已經讓 Sage 的 SSIS 的出版轉移給 Sage 於印度的分支,並確定 ISA 的會員 可以得到很大的折扣。我們也將可以用 便宜的價格賣給印度讀者(非 ISA 會員) (雖然在其他國家仍非如此)。我們很感 謝 Sage 支持這項方案,讓我們可以為 打破出版的國際不平等踏出重要的第一 步。我鼓勵 ISA 的會員用這個機會去使 整個政策更成功。購買 SSIS 的書籍吧! 也購買以後 SSIS 系列的書籍吧!■

> 兩種社會主義

by Mariya Ivanchev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何牙利



Misión Ribas 是個社會正義機構, 或稱為 Bolivarian Missions,由 Hugo Chávez 任內推動成立。其提供給中 輟生上學的機會。

我 2004 年在倫敦唸 【書時,有一次我參加 日 了討論 Bolivarian 教 育改革的會議,邀請來的講 者是委內瑞拉的教育者 Oscar Negrin。他一開始就說;「在 委内瑞拉,我們不讓小孩子 背誦那些抽象的教條,取而 代之的是教導他們重要的字, 像是母親、和平、Chávez總 統。」聽到這段話,我的心 跳加速了,因為我想起我在 保加利亞的求學生涯。那時 保加利亞還是社會主政權。 有一次音樂表演彩排,我的 老師 Toneva 同志要我握著我 媽媽的手,然後朗讀下面這 一段詩:「世界上最偉大的 母親一是黨的女英雄。」那 時我不知道什麼是黨, 只知 道我母親的確是世界上最好 的,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如 實告訴我的老師。之後全班 寂靜了好一會兒, 最終, 她 把那段詩句改了。一年之後 是1989年,從那時候開始, 我老師要我叫她「女士」, 不要再叫「同志」了。讓我 們把場景拉回倫敦的那場教 育會議。當我走出演講廳, Negrin 和他的聽眾們想必看 到了一個女孩的背影一這個 女孩是1988年民主轉型前夕 還在上學的女孩一此時此刻 跳走了。有句話這麼說:「如 果你不跳,那麼你就是紅 的。」可是,矛盾的是,當 我步出演講廳,有兩種感覺 在我内心中拉扯:一個是我 真的為我反對共產主義的家

庭感到自豪,可是另一方面, 我常覺得共產主義早就一去 不復返的想法,是不是太過 於天真了呢?

我在委內瑞拉的高等教育 改革這個議題上做了半年的 田野研究。我瞭解到我的自 豪是多麼膚淺。我不是為了 救贖我的反共思想而接觸這 個議題的, 而是我對於兩種 教育體系的差異感到興趣: 一個是東歐,另一個是委內 瑞拉。東歐的教育是從社會 主義民主轉型之後由知識分 子設計出來的,而委內瑞拉 則是剛好相反。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是我攻 讀博士的地方,在1991年由 富豪 George Soros、東歐異議 人士、以及西方自由派知識 分子所設立。這是一所私立 的英語教學的研究所學校, 被傳統的法西斯、族群民族 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所環 繞著。其教育目的是為了培 養新一代的後社會主義精英, 知曉西方自由民主和歐美的 科學思想。

相較之下, Bolivarian University of Venezuela (UBV) 則 是由總統 Chávez 所設立, 教育社會主義精英。UBV在 2003年反對 Chávez 的政變和 高技術石油工人的罷工之後 所成立的。這兩個事件背後 受到美國國防部的資金支持, 也顯示出 Chávez 的石油資源 重分配政策引起親美的精英 極大的反彈。Chávez 反對那 些精英對於經濟知識與資源 的壟斷,所以為了平衡這個 霸權,他的教育政策 Misión Sucre 讓 UBV 提供平等的教 育機會給半數以上的貧窮家 庭。教育內容則以在地知識、 跨學科、應用公共科學等為 主。

我到了Caracas 之後,心中總是戒慎恐懼。因為我從匈牙利的CEU來,可能會遭受到委國政府的質疑,尤其是我在旁聽了第一堂在UBV的

課之後,更加覺得如此。在 那堂課上,講者說 CEU 是專 門幫忙美國訓練 CIA 的地方。 不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瞭解到委內瑞拉並不是 一個集權主義的國家,而我 當然也不是間諜。我到的這 個國家是有自由選舉,而且 媒體會監督政府官員的國家。 我的報導人在 1958-1998 年之 間所謂的「自由民主」時代 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學生與知 識分子。我從他以及他提供 的訊息中,充分瞭解到我有 多麼大的偏見: 我是保加利 亞後社會主義學術下的產物, 毫不批判地擁抱西方價值。 在這些自我殖民的保加利亞 知識分子眼中,包括社會學 家,都瞭解到可以躲在學術 象牙塔內大肆批評那些落後 的國家。然後把學生分為好 和壞的,卻從沒想過是否社 會不平等所導致的這種後果。 最後,他們服膺西方的價值, 堅持「客觀的」科學,把一 切其他非市場的價值貶為「意 識形態 」。

當我擁抱 UBV 的原則時, 我瞭解這正在挑戰著我。即 使 1989 年宣稱是「歷史終 结 了,但是在委内瑞拉, 冷戰還持續進行著。為了避 免 1973 年智利的經驗、古巴 禁運、委內瑞拉的政變,委 國政府不能強行實行教育改 革。在整個20世紀左派奮力 保護的學術自主性,很諷刺 地現在被對手拿來當作武器。 保守派為了防止革命,不斷 地複製不平等結構。窮人對 高等教育的要求使得政府讓 大學學歷的人可以去 UBV 任 教。這開啟的雙重標準的問 題。學院中的人必須要瞭解 學術語言,然後又要瞭解窮 人的文化。這有點像是一方 面服從學院規則,另一方面 又馬上破壞之。

生長在社會主義國家的 我,花了很大的時間去瞭解 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面貌。而

> Sofia街道上 的故事

by Martin Pet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亞



Sofia街道上真正的clochard。

之,他們對此非常敏銳, 在這個體系中找到了生存 的方式。他們是流浪者, 是 Sofia 的 clochard 知 識 階級。

當我還是哲學系的大學生時,我認識了E。他是 Art Academy 的裸體模特兒,並在 Sofia 大學遊蕩。我的朋友則可以跟他

要得到海洛因。E的名字 對於保加利亞來說是很陌 生的,因為他的父親是 義大利籍猶太人,母親 是法國籍猶太人。他父親 是 Lukanov 首相最得力的 助手,據說這位首相命令 保加利亞的富豪在1990 年把共產黨的錢透過國 家特務都發給了人民。 在 1996 年 Lukanov 被 暗 殺後,他父親就被下令要 從此消失。他媽媽則是特 務機關的會計,1990年 之後則對超自然現象開始 產生興趣,1寫了一本書 叫做 Man, Spirit, Cosmos: Energy-informational Exchange。她最後到了尼泊 爾的當修士,從此消失。

我並不是說這些故事 都是真的,但也不是說 這些都是捏造的。這些 故事的的確確發生在過去 幾十年來的保加利亞。 所以,這是所謂E的生 命故事。他在1989年以 前在 Wiemar 的一間藝術 高中讀書。1990年他到 了 Magura一就是 Sofia 的 一個角落,一個兌換馬 克和美元的黑市集散地。 許多暴發戶說他們在那邊 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那邊他可以打賭球賽和 賭牌。後來他在 Sofia 的 Drama Academy 畢業,可 找到了工作,但是因為酗 酒和吸毒,工作就丟掉 了。之後只好在一家馬戲 團當小丑,表演高空鞦 韆。

幾天前我再次遇到E, 他失業了,可是戒掉了海 洛因, 獨居在一間小閣 樓裡面。他透過在公園朗 讀詩文賺取牛計、香煙和 酒的錢。他仍然喜愛講他 把他爸的 Mercedes 撞壞 的事情。我也見過他的朋 友,這些人和他一樣喜歡 在國家劇院前的公園和藥 房喝酒。讓我驚訝的是, 不是只有 E 是這個樣子, 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都 有類似的故事。其中一人 來自俄國,喜歡學斯拉夫 語和文化;也有一個美國 人,有三分之一的牛仔血 統,喜歡穿牛仔靴子和 Crocodile Dundee 的帽子。 很明顯的這就是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被社會所接納, 所以這些特別、具有異國 風味的喜好是為了彌補這 方面的不足。

但是這之中的每一個 人都記住了這幾年來的美 好時光。有人連同他的兩 個兒子被老婆逐出家門, 有人在畢業後從來沒有一 份穩定的工作。許多人則 是擁有高學歷。而且,由於還有許多親戚、朋友資有許多親戚、朋友是原本所擁有的文化。 本,這使得他們不會的之。 像是那些在公園拾荒的之 人那般落寞孤寂。所以這種的 人有所不同。像是E喜歡 說:「我不是 clochard。 我是 cloch-art」。

他們看起來都像朋友, 可是一旦我和其中的人 開始獨處時,他就會開始 說起其他人有多糟糕,像 是:X已經跑掉了,並帶 走路人給他買啤酒的錢; Y還在吸毒;Z和很醜的 女人上床了。他們被剝奪 掉了一切,包括物質、承 認、以及人生的期待, Sofia 的 cloch-arts 感覺起 來格外的痛苦,強烈地需 要自我的區辨,並且把其 他一切的方法都拋棄(像 是消費),才能達到這個 目標。不過,他們丟掉了 一切,但保留了創意,以 及一點點的邪惡。■

1. 這是個保加利亞共黨垮台 後第一年相當熱門的故事。 可見 Martin Petrov,

"The Discourse of the Supernatural in Bulgaria of the early 1990s." Sociological Problems 2010 1-2: 268-283 (保加利亞)。

>後共產保加利亞 對於大屠殺 的辩論

by Georgi Medarov, Sofia University, 保加利亞



這張圖來自Belgrade的猶太歷史博物館,可以看到保加利亞警察正在監控猶太人的遣送,把他們從保加利亞的Skopje (Macedonia) 送到德國的集中營,時間是1943年3月。

▶ 像 Maurice Halbwachs 告訴我們的,社會記 憶和集體認同密不可 分。1989年之後,最重要的 公共辯論之一就是在二戰期 間的保加利亞猶太人。這個 辯論告訴了我們:過去深深 影響了現在的政治。90年代, 大屠殺成為了政治主體性中 一個最主要的象徵資源,亦 即去區辨前共產主義和新反 共主義的能力。兩個政黨都 有相同的政治願景:加入歐 盟、新自由主義、民主化等 等。而且保加利亞的社會學 者 Andrey Raitchev 已經觀察

> 對待猶太人的兩種論述

二戰期間保加利亞加入的軸心國,並且被 Macedonia 所征服,也就是現在北希臘的塞爾維亞。在舊保加利亞的大被迫害,被剝奪公民權、歧視,剝奪財產,驅後被門之法西斯主義與精英所限制度。新的保加利亞猶太人則被迫逃亡到 Treblinka。

這些事件被前共產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所爭辯。1990年代黨報的社會學報導由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Studies 所執行,指出前共產主義者專門聚焦在猶太人的消失

議題上,想說明社會主義的法西斯本質。而反共者則聚焦在舊保加利亞的 Final Solution 上,特別討論精英的抗拒所導致的結果。他們都不重視反法西斯戰鬥分子的角色,尤其這些人比共產黨人有力,但是共產黨喜歡把他們描述成罪犯。

兩種論述都顯示出了對於 承認對方論述有其道理的無 能。保加利亞社會學家 Lilyana Deyanova 稱這個現象是後 共產的否定主義。否定並不 限於針對過去,反之,也標 示著對於他人立場的肯認的 無能為力。主體性鑲嵌在這 種社會記憶之中, 把對手的 觀點當作永遠地敵人來對待。 政治上的敵對主義用各種言 語詆毀對方;變態、叛國、 欺騙、侵略者等等。在這樣 的「反(anti)」論述中,民族 國家被認為是一個和諧的整 體。這把辯論簡化成政治問 題:猶太人有被拯救嗎?保 加利亞的社會民主或是法西 斯?很可惜,我們看不到其 他立場。

2001 年後,穩定的政治認 同瓦解了,兩黨體制取而代 之。當論及猶太人的命運時, 反共的論述相當普及。戰後 共產黨論述不具正當性,包 括那些反對法西斯的論述皆 是如此。驅逐猶太人被解釋 成「我們別無選擇」或是「這 些土地也不是我們的」和合 理化。可是,矛盾的是,這 些都在以下的論述框架中進 行:領土擴張是「解放」或 保加利亞的統一」。最近 我們也看到這些論述的鞏固, 也投射到 Macedonia。這被保 加利亞主流的政治與媒體視 為是「錯誤的歷史」。所以 最近在 Skopje 建立的大屠殺 博物館被描述為假的、空洞 的等等。這不僅是共產黨這 麼說, Macedonia 人也被視為 是敵人,在保加利亞散佈大 屠殺的不實謠言。

> 避免法西斯主義

真相是, 法西斯主義在 保加利亞被認為不具有法西 斯的特質。因為,我們沒有 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政黨,所 以沒有法西斯主義。所以對 於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也付諸 闕如。例如,沒有關於 Zeev Sternhell 對於法西斯主義意 識形態的分析。此外,也沒 有法西斯主義的破壞主義, 把公民身份的徹底毀棄,反 共主義,以其納粹的 Judeo-Bolshevism。總之,有股有意 識的力量在刻意避免法西斯 的概念,以避免平行而生的 後政治鳥托邦。不幸的是, 這些空白不只是出現在政治 中,學術中也是如此,社會 學亦如是。

然而最近出現了由歷史學

>馬來西亞的 計會科學

by Shamsul A.B.,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UKM), Kuala Lumpur, 馬來西亞



Raymond Firth (1901-2002)是馬來西亞殖民時代社會學創立的重要人物。

類學和社會學在正式 成為大學中的系所和 科目之前,他們就是 殖民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且 啟發了馬來亞的想法,而在 1963年之後,這就是馬來西 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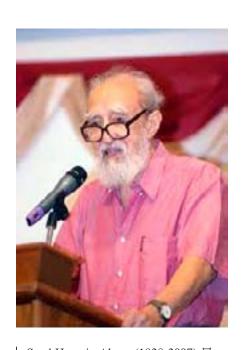
在殖民時期,殖民知識提 供了定義與規則的架構,讓 殖民者可以順利統治。這個 定義與規則的架構,亦即「分 而治之」。殖民政府就是這 麼統治殖民地的。大英帝國 皇家學院成立於 1823 年,就 是個殖民知識最主要的機構, 幫助統治馬來亞(後來的馬 來西亞)。其在馬來西亞的分 支機構是設立在 Straits Settlement of Malaya and Borneo 底下,於 1878 年成立,由 Calcutta 的東印度公司營運。 這個分之有其自己的期刊: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SBRAS)。 1923 年 改名為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 然後 1964 年叫做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皇家學院也發表 自己的 MBRAS 文章。

大約 135 年來,馬來西亞這個概念就是從該學院的出版文章中產生的。文章的內容涵蓋了歷史、地理、文

因此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在 二次大戰之後,那些被殖民 政府送來的學者之中,有兩 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者,他 們是社會人類學者 Raymond Firth 和 Edmund Leach。Raymond Firth 來馬來亞作國家的 社會科學研究;Edmund Leach 則是作馬來亞和 Sarawak 的社 會經濟研究。兩位學者都有 許多學生,也都在 1950 年代 早期從事馬來亞本土的田野 研究,看 Sarawak 的華人和原 住民, 也在新加坡研究馬來 人和華人的文化,在 Negeri Sembilan 研究唯一的母系社 會,另外也於 Johor 研究 Kiyai Salleh 千禧年運動對於馬 華兩族群之間關係的影響。 這群人生產出了很多很好的 研究成果。

下一代的學生則是在倫敦 Firth 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包 括 Abdul Kahar Bador (研究馬 來傳統領導), Mokhzani Rahim (馬來信用系統)和 Syed Husin Ali (馬來農民和領袖)。這些人後來都回到 University of Malaya (UM)教書。另外一位有名的學者是荷蘭訓練的 Syed Hussein Alatas,他出過一本有名的書叫做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這本書啟發了 Edward Said 的 Orientalism。這些學者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支柱。

政府也於 1969 年 7 月成立了民族認同系。這是在族群暴亂之後隨即成立。許多職員都是人類學或社會學者,並且多數畢業於馬來研究系。的確,在 1980 年之前,許多馬來西亞的高級公職人員都是來自這個系。

第一批的人類學者和社會 學者都從 UM 和 UKM 畢業, 

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 是 馬來西亞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政 治人物,同時也是社會學的創建者 之一。他也是著名的殖民主義批判 家。

議要將族群關係課程列為公立大學的必修科目。該計畫的內容就是由我領導的團隊在 2007 年所研擬出來的,並且在 UKM 成立了族群關係學院。

總之,人類學和社會學在 馬來西亞的社會科學中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別在 凝聚社會上有著不可抹滅的 貢獻。這些都和「馬來西亞」 這個概念不可分割一多元社 會、多元族群的精神,也蕴 含了社會的穩定動態張力。

>社會學志業的一生

訪談Dato Rahman



Dato Rahman Embong.

Rahman Embong 是傑出的馬來西亞社會學家,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以下的訪談呈現出了其個人生涯和馬來西亞社會學發展的交織故事,時間從殖民時期開始,一直到1991年後的新生。

布:讓我們從頭開始吧。你在殖民時代 長大,你是怎麼受教育的?這是一個很 不容易的成就。

RE:事情是這樣的,Michael,你最近到過馬來西亞,知道這是一個產油的國家,有2千8百多萬的人口,收入高,到2020年將會成為已開發國家。走到這一步,其實歷經了很長的時間,從農業到商業社會,那時是1957年的獨立時刻。你到馬來西亞的的時候,我們帶你去了首都Putrajaya,那之前是一片大的橡膠和石油田,原住民Orang Asli 居住的一大片叢林地。有些人認為行政中心相當耀眼,是個頂尖的城市,許多國家都羨慕不已。這些是 Mahathir 想要完成的夢想,想要留下來的政績。

現在讓我回到我的身世。我出生在一

個「中產」的農人家庭,不特別富有,但是也不會太窮。我的出生地是 Terengganu,那時是馬來西亞半島之中最落後的一個城市。我生於 1944 年,當時日本佔領已經快結束了,但是日子很艱難,因為食物短缺,需要配給。我爸爸是位padi 農民,也是伊斯蘭教的學者。他不讓他的小孩上英語學校,而要去阿拉伯或是宗教學校。他也詛咒英國,因為英國人在日本攻過來時落跑了。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相當勤奮工作,耕作我們家的 padi 田來養育 8 個小孩。我是老么。其他的鄰居也都是耕田維生,這些農民一點也不是外面所描述的那樣懶惰的原住民,這種東方主義的歧視論述後來被 Syed Hussein Alatas 的 1977 年的書所不以為然。

我的父親於 1949 年過世。那是我出生後的第 5 年。人家告訴我我爸死於瘧疾,發瘋數日後死去,而我那時相當難過。但是今天,那些記憶已經相當模糊了,醫院、診間、醫生等,都是很遙遠的事情了,我們甚至不知道死因究竟為何。我父親過世後,我母親的生活更加困苦,為了養育 8 個小孩,她成了小販,賣蔬菜、餅乾、菸草等維生。

身為家中老么,又還在上學,我不用 向我的兄長們那樣幫忙家務。不過我還 是跟我媽到市場去賣菜,幫她搬運東西。 那是個典型農村社會。

在我們的那個村子裡面,沒水沒電。 我家從沒有桌子和椅子。晚上我們都點 煤油燈唸書。我的哥哥都上馬來的小學, 然後多上了一或兩年的阿拉伯或是宗教 學校。最他們都沒有繼續升學,去工作 了。不過我比較不一樣。我媽媽和其他 哥哥不希望我跟他們一樣,希望我到村 子之外去發展。所以我小學畢業和宗教 學校畢業後,我到城鎮上的英語學校 對「特別馬來課程」感興趣, 因為這樣我可以在第三年生到 Primary Six。後來我成績是最頂尖的,得了獎學 金 到 Royal Military College 去 唸 書。 值學校在馬來亞的西岸,是個精英的多 族群學校,由英國人在 1953 年設立, 主要訓練在地的軍事和政府人才。整個 Terengganu 之中只有包括我的 5 個人上 大學。我又是唯一一個到其他城市並且 出國留學的人。

在高中畢業後的大學期間,我到了「母國」英國,因為有得到聯邦獎學金,希望我們將來可以回國擔任公職。許多 其他的頂尖學生也是如此。

布:你到英國留學,特別是在Leicester和SOAS的經驗如何影響了你的學術生涯?

RE:到英國唸書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從此大開眼見,並深化了我的思考。我於 1965 年到 Liecester 唸社會學,於 1968 年取得學士,後來在 SOAS (倫敦亞非學院)拿到了區域研究的碩士。我上了許多知名學者的課。60 年代後期,倫敦和整個歐洲都有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並且反美帝,反越戰。中國革命和我們是受到各種社會學學派思想的洗禮,是受到各種社會學學派思想的洗禮,是受到各種社會學學派思想的洗禮,我變得不過讀各種左翼期刊,像是 New Left Review 和 Monthly Review。因為這樣,我變得很政治化與激進化。許多我這一代的馬來西亞的學生都是如此。

布:你回到馬來西亞之後呢?那時國家 已經獨立15年了,你怎麼重新認識這個 新社會?

RE:我在1970年12月31日回到馬來西亞,那是1969年5月13日的種族流血衝突後的第19個月。我那時候教育許多年輕人,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其他等等,然後團結他們。我們認為問題不是種族,而是階級。

RE: 回國之後, University of Malaya 主要是以英語授課,新的大學是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 UKM),於 1970年5月成立。這個是馬來民族主義者努力的成果,希

望用民族的語言一馬來文教學。馬來文 政策在 1980 年有全面的影響,學生當時 是精英,只有 18-24 歲這個族群的 1%。 不像今天已經到了 30%。

布:社會學呢?

RE: 社會學那時發展得很快。首相的系上 的 Harvard Advisory Service 由 Samuel Huntington 所領導,並有 Manning Nash, Myron Weiner,和 Nathan Glazer等人,寫了一份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National Unity 的報告,發表在 1969 年的衝突之後,建議馬來西亞大學要處理這個問題,也希望他們可以訓練這方面的人在。UKM 因此設立了人類與社會系。所以當我回國之後,我就到 UKM 任教。因為他們告訴我他們需要我這個碩士的專長,特別是我在倫敦的訓練。我心中也這麼想:這份工作可是我夢寐以求的啊!

布:1970就像是社會學蓬勃發展的年代,儘管 Harvard 的團隊關心的是民族國國家建造,我的理解對嗎?

RE: 在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初期是如此,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發展的大好年代,有許多辯論進行著。但是讓我說一下這個 Harvard 團隊。首先,我是UKM 人類與社會系的第四個老師,其他三位都是 UM 畢業的。事實上在 1960 年代,也就是 Harvard 團隊之前,人類和社會學已經有人授課了,是在 UM 馬來研究系的文化課程底下,知名的學者包括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Syed Hussein Alatas (後來到新加坡)和 Syed Husin Ali。所以當我們說馬來西亞的人類與社會學是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的產物,那麼 Harvard 團隊不是催生者,因為早有人在孕育播種了。

大辯論在許多學科之間進行著。文學的學者特別如此,堅持民族文學的制度化,推崇社會的藝術,抨擊純藝術。歷史學者則拒絕殖民(東方主義)的史觀。經濟學者辯論「巨變」。我們這些年輕社會與人類者則辯論批判實證主義,結

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特別是那些 Harvard 團隊的觀點。

在其他方面,這時也是伊斯蘭 dakwah 運動的開始。這是學生和青年運動的一部分。校園內為了這個議題而有反美帝、反越戰、反以色列等的運動。內部我們則支持農民鬥爭和無住屋者的抗爭,也關心貧窮問題,因為這是全人口 50% 面臨的。另外我們也反貪污和精英統治。

我個人來,這是我在英國學術生涯和學運經驗的延續。我有社會學理論作為指引,教了兩門課:發展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而我的同事教其他科目像是農村社會、都市社會、種族關係等等。我自身不被禁了。我朋友和我在裡面不只是寫社會學議題,那還是一個公共社會學說,那還是一個公共社會學的形式。儘管那時還沒有這個名詞。我們的立場很清楚:沒有所謂的價值中立,也沒有現代化理論所說的多國組織發展。我們認為發展和低度發展是一體兩面的。

布:後來經濟危機來了,你可以談談這個歷史和社會學所給的影響?

RE: 1974 年是另外一個對許多人來說的生命轉捩點。當年 8 月在 UKM 舉辦了第一次的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大回。我是籌辦委員會的主席。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會議,許多辯論產生,也辯論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這也是另一個典範之戰。許多大學的講師和學生很積極的參與。那時也決定在 1978 年成立了馬來西亞社會科學會 (MSSA)。

學生運動在1974年來到高峰,後來 被鎮壓後就好景不再。那是個轉捩點, 是個歷史的轉捩點。一位當今反對領袖 Anwar Ibrahim 那時領導穆斯林學運,後 來被逮捕入獄,後來釋放後,他被首相 Mahathir 延攬入閣,後來成為副首相, 直到1998年關係生變為止。

學院之中其中一位資深社會學家 Syed Husin Ali (UM) 也被逮捕,並服刑 6 年直到 1980 年。有趣的是他即使服刑仍然保

留教職。他的名望很高,出獄後不久當選 MSSA 的會長。他擔任 10 年會長,到 1990 年為止。

1975 年,也就是大規模逮捕後,政府更加嚴格執行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這是一個箝制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法律。這個法律一直到去年才被修改掉。

布:1991年政府和反對黨之間有了妥協, 大學重新開放,那你這段期間呢?

RE: 嗯,你或許可以猜到,我為了避免被逮捕,必須在1974年後出國,所以離開了馬來西亞20年。不過我還是很關注其發展。

1992年我回國,也是冷戰結束後的幾年。政府開放了許多 UKM 的職位,讓我有機會可以在 1995年回到原本的系。事情都變了,大學和政府都服膺於市場規則,教育也商品化,不再是公共財。傳統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包括社會學與人類學,都被科學和管理所超越了。我學校的社會科學的也變了,社會學和人類學不再是一個系,剩下一個小的分支。

許多我這一帶的資深社會學者和人

類學者不是退休就是繼續教書。可是仍有一位社會人類學者仍然很活躍,他是 UKM 族群研究的創建者,從事學術和政 策研究。

對我而言,我在系上重建之前離開了,後來成為全職的研究員,從事跨學科研究,在國際研究院,成立於1995年。 後來我在2001年成為發展社會學系的教授,2009年榮譽退休。

當我回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重新接觸 MSSA。我在 2000 年當選為會長,就像 Syed Husin Ali,我擔任了10年任期。卸任之後,我是該會的特別顧問,至今仍是。

布:你見證了馬來西亞社會學 40 年來的發展,那你怎麼看未來?

RE:儘管變化很大,我仍然覺得充滿希望。年輕人重新對社會學燃起了熱情與希望,不過是透過跨學科的方式。他們可以看到社會理論和社會學觀點的裡亮,也可以使用方法去分析是會。理想性還未消失。雖然整個社群不大,但是成長得很快。MSSA可以幫助看到這些改變,而且現在和身為ISA會長的你可知道這有多麼的迫切。這讓我們深化和拓展了視野。我們期待日後有合作的機會,想必讓馬來西亞社會學更加有助益。

> 革命後的 突尼西亞社會學

by Mounir Saidani,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亞



Mohammed Bouazizi,一位點火自 焚的水果攤販,觸發了阿拉伯革 命。

是 尼西亞社會學家 有三個矛盾的觀 點來解釋現在的 突尼西亞:政治巨變,言 論自由擴張,以及新社會 運動的到來。突國快速的 社會變遷讓社會學家必須 回應這個變化。

> 後革命脈絡

Ben Ali 的獨裁在 2011 年 1 月 14 日劃上句點。從此整個國家歷經了「反對一切事物的戰爭」。衝突不斷上演,新的公共敵為上演,新的公共被商人是 Salafists,因為其被認為是對於突尼西亞最有經濟 250 組織也在政治領域中出現很大的衝突。約60 組織也在政治領域中出現很大的衝突。約60 組織,很難達到相互的理組織,很難達到相互的理解。

社會統計和其他資料 現在變得可加容易取得, 可是很沒有組織,所以 也不太能夠幫忙建立起 統性的知識。有了言論自 由,雜誌、報紙、媒體、 電視、電台等等也都成 為了意見抒發和鬥爭的場 所。

過去的行動者影響了現在。過去的興趣也成為

> 動盪年代的社會學

我們一共有3個社會 系,60個社會學家。這 些人可分成3群。第一是 出版社會動盪相關書籍的 學者,為數不多,可能只 有4或5個。差不多也有 相同數目的人出版文章。 多數不發表動亂的文章, 因為「正在進行的社會運 動很難被分析,變化太快 也混亂。」在革命之前, 有超過2或3個的社會學 家處理社運的題材。而後 革命時代的第一年,第二 類的社會學家寫作了一些 關於自身經驗的東西。每 週甚至每日的報紙都是他 們發表的場所,紀錄所見 所聞。許多致力於找出運動者是誰。有些人則是用blog或 Facebook 紀錄。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還 有一個小媒體對社會學有 興趣。可是後來就沒了。 至於傳播知識這回事,突 尼西亞的社會學家正經歷 新的媒體關係,有的媒體 需要這些學者去討論政治 社會的議題。 有些學院人 十已經背成編輯者,在一 些知識性的雜誌工作,有 些人則在非學術的研究中 心任職。這些其實都不再 生產學術知識了。他們從 事什麼樣的工作呢?我們 不用太樂觀,因為他們的 環境並不太好。下一個問 題則是:是否這些媒體公 司會給予公共社會學一的 推廣的契機?

有一位突尼西亞社會 學家曾說過「我的發表都 是來自我的個人努力,別 人幫過我。」也有人說: 「我們這些不是頂尖的社 會學者沒有什麼機會。那 些活動都是給有頭有臉的 人參加的。」所以,年輕 社會學者面臨了很困難的 處境:「當一個人必須獨 自奮鬥時,年輕人才就會 流失了」。不過我們還是 有新的期刊:「思索今日 的突尼西亞社會:人文與 社會科學得年輕學者」。 這個期刊把法語的寫作者 找來一起發表,並召開會 議,於2012年7月舉行,和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 Maghreb Contemporain (IRMC) 合作。除此之外,從獨裁垮台之後,25年來,我們也就沒有什麼其他給學生參加的會議了。

其中一個被突尼西亞 社會學者採用的回應是去 到國外期刊發表,以保 持能見度。第一個國際的 社會學會議,以「阿拉伯 革命的社會學」為主題, 在 2011 年 3 月 於 Sidi Bouzid 舉行, 這個地方 是 Bouazizi 事件的發生地 點,他就是那位點火自焚 的水果攤販,此舉動也觸 發了突尼西亞革命。但是 這個會議卻吸引不到7個 突尼西亞社會學家。其中 1人還是在 Beirut 居住, 一個是阿爾及利亞人,另 一人還是從英國來的黎巴 嫩人。

> 新的研究機會

研究的大門更加敞開了。 過去對於政治干預的迫 害,的確箝制了言論的自 由。而今這個限制已經 了,受訪者也將可以更暢 所欲言。研究者也可以 期照片、影像、日記等 當作研究素材。可是, 的理論框加仍待發展。

我們可以說突尼西亞 社會學家若要檢視這個變 遷的社會,仍然面對許多 的阻礙,特別是發展出 的理論視野。快速的後 選在強人政治倒台表 必須用更科學的方式會學 必須用更依舊:社會學家 可以掌握住這個千載難逢 的契機嗎?■

>影像社會學

訪談Joyce Sebag和Jean-Pierre Durand

University of Evry, 法國



Joyce Sebag.

Jovce Sebag和 Jean-Pierre Durand 是一對影 像社會學的夫妻檔,在University of Evry 的 Center Pierre Naville 任教。之前他們投身 於工作社會學,然後1995年Sebag和Durand 設立的 Image and Society 的系所。其所訓練 的碩士與博士接受特別的訓練,以社會科學為 底,然後製作影片。教學之餘,他們也拍攝了 3部紀錄片: Dreams on the Line, 關於在加 州一家汽車工廠工人的工作處境; Nissan: a History of Management 是關於一間跨國公司 的管理;50 Year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Boston 關於美國的 Affirmative Action。由於 他們的努力,法國社會學會最近接受了影像社 會學成為正式的次領域。Jordanna Matlon 負 責這個訪談,他是Toulouse 的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博士後。



Jean-Pierre Durand.

JM: 你所謂的影像與視覺社會的差異為何?

JS: 我想視覺社會學已經存在很久了,比較像是 對照片或是影片的分析,而非思考圖像的一種 方式。而我們想要做的是去找出解釋照片和影 片的社會學理論。

JM: 什麼是影像社會學家的特長?

JS: 當你研究某個東西然後完成之後,你會感到 距離很遙遠。你會覺得你自外於該對象。所以 其中一個用媒體的理由就是研究者永遠置身其 中。

JM: 影片是這個方法最必要的部份?

JS: 是的,影片是一種可以用來說明科學並非存在人們之外的一種方法。這包括了人們被研究或是描述的過程。你所說的就是這個。紀錄片是一種反思的空間。我們作研究去開創這個空間,然後用這個方式和人們討論,特別是那些不在這個情境下的人,並且同時創造出某些新的東西。這是一個討論的空間,也是納入多元觀點的方式。

我們會看到這些在影像中的人是研究的演 員。你可以看到他們。他們在思考。他們不是 客體。

JM: 可以舉些例子嗎?

JPD: 例如在我們的紀錄片 (Dreams on the Line) 裡面,我們不說很多話,不討論工人與工會。也不是說沒有,但就是一點點而已。然後有些人說了很多工會的壞話,像是工會是給…

JS: 懶惰的人

JPD: 懶惰的人。是,有個人這樣說。然後有個女人說「我是女人所以我不能罷工。」當你寫作是,你可以離開,因為這那只是一秒鐘而已。可是事實上我們運用這個註解去顯示為什麼以及人們如何接受新的處境,像是日本的工作規則。然後工會必須去和成員相處,所以要保持沉默。

JS: 我們看到工作的人們很急也很累,壓力很大。但是我們也看到他們沈靜和放鬆的一面。所以這必須去讓大家看到他們有多麼沈靜。不過話說回來同時我們也訪談他們,說「這是個苦差事,很苦很苦啊。」這不是 Charlie Chaplin 的電影喔。所有都看起來很安靜。於是我們並列了人們感覺的不同,然後稱之為 Dreams on the Line,因為每個人都夢想要逃離這裡!這是個對話的開始,討論過於簡化的真實,以及過於暴力的簡化。

JPD: 像是 Joyce 說的,這是主體社會學,但是也是理性的。我有我們的觀點。我們預設了我們的主體性,不過這筆寫作還難。沒錯,我們在做選擇,我們取景和編輯影像等等。可是他你攝影時,你不能只是輕易放棄某些不方便的真實。這是個大問題啊!我寫作了15本書,我知道怎麼去呈現重點和論證,可是拍攝影片不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因為社會事實就在面前。有些社會學家可以像是魔術師,但是你不可以,因為你是影像社會學家。

JM: 你們怎麼看待影像社會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

JPD: 我相信我們的角色是去揭露被隱藏的社會生活。因為這樣,我們必須去理性的解釋事物,但是也要被聽見,去吸引人們,所以要去處理情緒。寫作的話,我想是更難表達我們的情緒。

JS: 例如當我在訪談時,有一次是位女性關於 affirmative action 的影片。她的回應透露出了他的尊嚴與控制。這樣她可以挑戰他些使用暴力的人。我想尊嚴就是很重要的。

JM: 你認為在影像社會學,若是用情緒去說服, 這是否有被批評操弄的空間呢?或者這是另一 種理解的方式?

JS: 我想沒有一種單一理解的方式。我們的理解不是理性的。理解帶有情緒,並且這是可被理解的。的確,你有可能瞭解更多,可是,對啊,你可以在書中操弄,而且更簡單啊。在影片中你與影片的人的關係也在變化。我在作田野時,有個工人說:你說你在作研究,而我們幫你,可是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至對你有利而已。

JM: 像是剝削。

JS: 是啊,向剝削。但是當你看到人在影片中時,他們真實存在。或許你可以向他們解釋,或許這也是另外一種剝削。可是只少我們說「你存在著」。你思考,你說話。而且可以看到物理的存在與聽到說話的聲音。而且很重要的是去顯示出人們不是陰影,而是真實的人。他們會思考,你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臉。我們不是剝削他們,把部份的他們放到影片而已。

JM: 那你面對的挑戰是什麼?

JPD: 很多人,包括公眾、社會學、學者等無法解讀影像的人。在學校,我們學習怎麼讀和寫字,可是從來沒有學怎麼閱讀影像。有許多影片專家,像是影片分析家,照片分析家,影評家等等,但是專業和公眾之間的差距相當大。這是個問題,原因是公眾一包括了很多社會學家一並沒有能力閱讀影像。我想這恐怕是最大的挑戰。

JS: 我想有需要去訓練怎麼閱讀影像。

JPD: 在一張照片裡面你有對這張照片的感覺, 但是若你看到照片,你也要想這張照片是在哪 拍的,以及什麼在照片以外。

JS: 當你秀出一張影像時,同時也沒秀出很多東西。

JPD: 對,這裡有個框架,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

都是在框架之外的。

JS: 對什麼學家來說,這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同時都在看什麼被看到,以及什麼沒被看到。

JPD: 對,所謂的脈絡。

JS: 脈絡,沒錯,就是說什麼框架之外,什麼被 隱藏起來了,以及什麼在你面前。

JPD: 很多的人只看框架裡面的東西,但是如此就不可能瞭解一個更大的社會,也就是更大的圖像。

JM: 你已經談論如何瞭解影像的訓練了。我的想像是這或許和影像社會學更有關。可以說一下你在 University of Evry 的碩士課程是如何開始的嗎?

JPD: University of Evry 在早期 90 年代成立,是四所 Paris 郊區大學的其中一所。我是工業社會學家。我們有個很聰明的校長,推崇創新。 Joyce 找到他並且談有關電影社會學得構想,但校長說:「我沒有預算,若你能找到預算,我當然願意支持。」

JS: Jean-Pierre 找到資金。他是汽車產業的研究者,而產業的管理階層願意提供財務支持給學校。他們贊助我們,於是我們買了第一部攝影機。此外,在學校訓練的方面,第一年,我說:「OK,若你要學到東西,要畢業,那麼什麼都要學。」所以他們必須學聲音、攝影、導演、轉每一樣技巧,此外還要修社會學、歷史、人類學、影像歷史、圖像分析等的課。這些一年內要學完。然後我們要求教育部認證這項訓練,最後 1997 年設立了影像和社會的碩士學位。這個學位要求學生拍電影當作論文,並且獨立完成。

JPD: 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提供多重訓練的學位: 技巧、影像、社會科學等等。

JM: 你說的唯一是指在法國還是全世界?

JS: 我不知道全世界的情况!但是我想在法國若不是唯一,也是第一個。

JPD: 現在我們有 20 個碩士生和 7 個博士生!

JM: 現在你們已經訓練出那麼多專業人士了,你認為從學術的角度而言,你們失去了影像社會學家嗎?或是你認為他們還是會認為自己是影像社會學家呢?

JPD: 這完全看他們怎麼想。有些人對於社會與 政治很有興趣,有些學生從事社會運動。我們 告訴他們社運不必然讓你做好的影片,因為你



Sebag 和 Durand 的第二部有關 affirmative action 的電影。正在製作中,這是其中一幕。電影叫做 From Mississippi to Boston: a Family Trajectory。講述一個奴隸家庭一路奮鬥到 Harvard 的故事。

從事社運,有特定的觀點,所以你不會願意去 從其他角度看事情。因為這樣,我會用大約6 個月的時間去告訴他他必須改變心態,去用更 大的角度看事情。這些人一旦瞭解了這點,他 們會成為非常好的影像生產者,因為他們對社 會有信念。

JM: 那你想那些博士會對教學有興趣嗎?

JPD: 有些人會成為紀錄片導演,是非常高層次的導演。其他會當老師,進入學術。但他們知道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是很困難的,因為首先必須知道影像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正朝向那個方向。或許只有3或4所大學接受影像社會學,位子很少,這是個問題。我們才剛開始呢!■